

20世纪 诺贝尔文学奖

颁奖演说词全编

[第四篇]



毛信德 / 蒋跃 / 韦胜杭 / 译



外汇管理 调查与研究

——国家外汇管理局天津市分局2008—2009年调研文集

林铁钢 副主编
吴盼文

 中国金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词全编/毛信德等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1 (2010.3 重印)

ISBN 978—7—80647—286—6

I. 2… II. 毛… III. 诺贝尔文学奖—演说—汇编—世界—1901～2000 IV. H0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2149 号

书 名: 20 世纪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词全编
作 者: 毛信德 蒋 跃 韦胜校译 毛信德校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 WWW.BHZWY.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56
字 数: 80 万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定 价: 118.00 元 (全四册)
书 号: ISBN 978—7—80647—286—6

邮政编码: 33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目

录

1986 年	沃尔·索因卡	(1)
	颁奖词 (拉尔斯·吉伦斯顿)	(2)
	获奖演说 历史必然导致现在 ——献给纳尔逊·曼法拉 (索因卡)	(6)
1987 年	约瑟夫·布罗茨基	(26)
	颁奖词 (斯图尔·埃伦)	(27)
	获奖演说 (布罗茨基)	(30)
1988 年	纳吉布·马哈福兹	(43)
	颁奖词 (斯图尔·埃伦)	(44)
	获奖演说 (马哈福兹)	(46)
1989 年	卡米洛·何塞·塞拉	(51)
	颁奖词 (克努特·埃伦德)	(52)
	获奖演说 虚构颂 (塞拉)	(55)
1990 年	奥克塔维奥·帕斯	(67)
	颁奖词 (谢尔·埃斯普马克)	(68)
	获奖演说 寻求眼前 (帕斯)	(70)
1991 年	纳丁·戈迪默	(83)
	颁奖词 (瑞典文学院)	(84)
	获奖演说 (戈迪默)	(86)



1992 年	德里克·沃尔科特	(98)
	颁奖词(谢尔·埃斯普马克)	(99)
	获奖演说 安的列斯群岛 ——史诗往事的断想(沃尔科特)	(102)
1993 年	托妮·莫里森	(119)
	颁奖词(斯图尔·埃伦)	(120)
	获奖演说 被剥夺的语言和语言的被剥夺 (莫里森)	(123)
1994 年	大江健三郎	(131)
	颁奖词(谢尔·埃斯普马克)	(133)
	获奖演说 暧昧的日本与我(大江健三郎)	(135)
1995 年	谢姆斯·希尼	(145)
	颁奖公告(瑞典文学院)	(146)
	获奖演说 光荣属于诗歌(希尼)	(148)
1996 年	维斯拉娃·希姆博尔斯卡	(165)
	颁奖公告(瑞典文学院)	(166)
	获奖演说 诗人与世界(希姆博尔斯卡)	(168)
1997 年	达里奥·福	(174)
	颁奖公告(瑞典文学院)	(175)
	获奖演说 小丑不容丑化(达里奥·福)	(177)
1998 年	若泽·萨拉马戈	(186)
	颁奖公告(瑞典文学院)	(187)
	获奖演说 怎样使角色成为主人 而作者只是他们的仆人(萨拉马戈)	(190)
1999 年	君特·格拉斯	(202)
	颁奖公告(瑞典文学院)	(203)
	获奖演说 “未完待续……”(格拉斯)	(205)



1986 年获奖作家



1986 年获奖作家

沃尔·索因卡

〔尼日利亚〕沃尔·索因卡

Wole Soyinka (1934—)

沃尔·索因卡是非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戏剧家、诗人兼小说家。他出生于尼日利亚西部阿加塔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校长，1954 年赴英国利兹大学求读，显示出创作才华，得到戏剧评论家 G·W·奈特的赏识，1957 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留校从事对美国杰出戏剧家尤金·奥尼尔的研究。在此期间创作了两部重要的剧本：《沼泽地的居民》(1958) 和《狮子与宝石》(1959)，后者同年由伦敦皇家剧院上演，作者也被聘为该剧院编剧。索因卡于 1960 年回国，任伊巴丹大学戏剧教授，并创建了国家剧团“1960 年假面”（后改名为奥里桑剧团），为尼日利亚独立庆典创作了舞剧《森林之舞》。

60 年代是索因卡戏剧创作的黄金时期，先后写出了《强种》(1963)、《孔其的收获》(1965)、《路》(1965) 和《疯



20 Shi Ji Nuo Bei Er 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 颁奖演说词

Wen Xue Jiang Ban Jiang Yan Shuo Ci Quan Bian 全编

子与专家》(1970)等剧作,其中《孔其的收获》揭示了尼日利亚的社会现实,主题明确、艺术成熟;后两部作品内容荒诞,手法新颖,表现了作者评论时政的特色。在这些剧本中,既有西方传统戏剧的影响,又有索因卡出身的约鲁巴部落的民族文化因素。

1965年,索因卡在拉各斯大学任文学教授,同年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阐释者》,通过几个留学西方回国的尼日利亚青年的描述,反映了国家的变迁和矛盾冲突。1967年8月,尼日利亚爆发内战,由于政治原因索因卡遭到囚禁,两年后出狱,重返伊巴丹大学创立戏剧研究所,1972年起又兼任伊费大学戏剧研究教授,1975年依靠政变上台的戈翁政府被推翻,索因卡在新政府内短期任职,不久因与当局产生政见分歧而辞职。

索因卡的声誉于1979年达到高潮,此年他率领剧团在美国芝加哥演出他的新作《死神与国王的骑兵》,获得极大成功;1981年自传《童年的岁月》的出版,进一步提高了他在西方文坛的影响力,为他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基础。他的诗歌代表作有《艾丹雷及其他》(1967)和《狱中诗抄》(1969)等。

【获奖评语】 由于他的文学天才——他的艺术技巧、语言魅力和独创性——的非凡成就,索因卡的热忱尤其表现在对非洲传统的信奉之中,并成功地综合了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为人类的自由而献身。

颁奖词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 拉尔斯·吉伦斯顿

使用英语写作的沃尔·索因卡于1934年出生在尼日利亚,他是以戏剧家的身份而受到广泛尊重的,其实他的作品还包括一些重要的小



1986年获奖作家

沃尔·索因卡



说、诗集和一部生动风趣的自传以及大量的论文、随笔。他是一位非常活跃的戏剧家，他的戏剧作品曾在英国和本国广泛演出，而且他自己还扮演角色亲自登台，同时还耗费精力致力于戏剧创作和方针的论争探索。本世纪60年代，尼日利亚发生了内战，索因卡因为坚持维护自由、反对暴力和恐怖行动而遭当局逮捕，直至两年多以后才获得自由，这段艰难的经历对他的人生观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索因卡的父亲是一名教师，母亲是一名社会救济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基督教徒，他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他曾在作品中描写过自己在乡村中的儿童生活。但是他的祖先曾产生过巫医、邪教信仰者或非基督徒，于是方士、幽灵、妖精等等成了活跃于非洲原始传统现实的因素，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神话世界，更显示了一种有着悠久口头流传历史传统的非洲文化。对于索因卡来说，幼年时代的这些感染无异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而复杂的养料，也形成了他与非洲传统不可分割的关系。

早在青年时代，索因卡就以戏剧作品闻名于文坛，他把非洲的题材、非洲的语言方式以及喜剧创作特征联系起来，探索出一种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他在戏剧作品中熟练而广泛地使用植根非洲文化传统但又属于舞台艺术的技巧手段，诸如舞蹈、哑剧、假面戏、典礼、节奏音乐、角色演说和戏中戏等。他的早期戏剧大多显示轻松活泼趣味盎然的风格，采用恶作剧、讽刺嘲笑、生动有趣的对话等形式，反映出一种既喜又悲或怪诞荒唐的生活情态，典型代表就是被人们称为非洲的《仲夏夜之梦》的《森林舞蹈》。在作品里，出现有鬼魂、幽灵、树精、神抵和一位半神半人的人物——奥根。剧本写了人类的创造、艰难和牺牲精神，外貌酷似普罗米修斯的奥根就是一位伟大事业的实践者，他意志坚强，又有艺术才华，还精通作战谋略，他似神非神半人半神，他有巨大的创造力又有破坏力，他成为索因卡笔下多次出现的双重形象的典型人物。

索因卡是一位博采众长的剧作家，他博览群书思想敏锐，他的戏剧深深地扎根于非洲社会和非洲文化之中，但他精通西方文化和西方



1986年获奖作家

沃尔·索因卡



戏剧，从古希腊悲剧到贝克特^①和布莱希特^②。同时他也精通于戏剧以外的西方文学，即使像詹姆斯·乔伊斯一类作家的小说也会在他的作品中留下痕迹。索因卡与先锋派也有着血缘关系，在他的诗歌小说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表现。

在尼日利亚内战和被关入监狱时期写的作品里，索因卡突出了精神的、社会的和道德的悲剧冲突性质，他把那些复杂的、险恶的演变记录到作品之中，写出了人类善与恶、破坏与建设的矛盾，以讽喻和嘲笑的方式，对社会、道德、政治的各类问题进行神话般的戏剧创作。这一时期的索因卡，其创作活力决非低于早期作品，恰恰相反，他的作品更显示出讽刺、幽默、荒诞和喜剧色彩，对话更为深刻，人物更有个性，情节更加夸大到滑稽和荒唐的地步，使整个剧本在富有活力的结尾中表现出作者的深沉。索因卡并非把非洲的神话素材和欧洲的文学积淀进行简单的嫁接，他是以前者为艺术母体，采用独立的操作模式，把神话、传统、形式融为一体，成为他的创作的营养剂；所以，这不是一个民间传统的简单重复，不是一个异国情调的简单重复，也不是仅仅在化装舞会上穿件衣服，而是独立的复合式的工作。索因卡曾把他的这种广泛猎涉的创作意识称之为“有选择的折衷主义”——这表明，他需要的就是有目的的独立的选择。《死神与国王的骑兵》是索因卡后期一部令人瞩目的作品，它表面写的是西方道德习俗与非洲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但却呈现了许多思想内容，其中有讽刺、惊奇、贪婪、残酷，也有诗意。所以，它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不同民族之间文明的冲突，它以一个祭祀典礼为核心开展情节，深层次地探索了人与神的状况，正如索因卡自己认为的，这是一部描写命运的包含神秘内容的宗教剧，涉及到人类的自我认识、自我实现、生与死的契约和未来的前景。

索因卡也写了一些非戏剧作品，有叙述狱中生活的自传体故事

① 萨缪尔·贝克特 (Samual Becktt, 1906—1989)，荒诞派戏剧代表作家，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②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 1898—1956)，德国戏剧家、诗人，曾创立“史诗戏剧”理论。



《人死了》，描写尼日利亚知识界的小说《阐释者》；还有讽刺小说《混乱的季节》，它以俄尔甫斯与欧律狄斯^①的神话传说为契机，以腐败野蛮的政治状况为背景，以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为手段，写出一个一定程度上的复杂社会。以监狱生活为内容的诗作是索因卡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其中有部分是在狱中写的，显示了他的刚毅、坚强、自尊和活下去的决心，这些诗简练而富有意象，但由于禁欲式的浓缩，有时又显得难以洞察理解。要真正读懂它们也许还需一些时间，假如一旦我们真正能理解了，它们就会向我们提供诗人在那个残酷而艰辛的时期里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力量的依据，会放射出令人惊讶的能量。

如前所述，索因卡在创作上最杰出的成就是戏剧作品，它们一旦问世便在舞台上进行演出。它们不但是以舞蹈、音乐、假面舞会和喜剧内容为基础的艺术，也是表现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的想像力和理解力的文学作品，它们可以供人们阅读并能使读者深深喜爱，它们扎根于深刻而厚实的文化之中，这种文化又给作家带来了艺术的灵感和栩栩如生的魅力。

尊敬的索因卡先生：您的多才多艺的创作成果，来自于您对祖国的古老传统文化和欧洲文学遗产的综合与继承。但在这之外，在您的伟大成就中还有第三种因素，一个极为重要的构成内容——那就是您作为一位有创造力的真正的艺术家、语言大师、戏剧家和诗人所拥有的责任感，这一责任感使您对于前人和现代人类普遍而有深刻意义的问题进行思考。

现在，我荣幸地向您转达瑞典文学院对您的热烈祝贺，并请您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① 均为希腊神话的诗人、歌手。



获奖演说

历史必然导致现在

——献给纳尔逊·曼德拉^① 沃尔·索因卡



1986年获奖作家
沃尔·索因卡

在伦敦剧院的舞台一侧，曾出现过一个人令人惊讶却绝非杜撰的情景：在一切就绪演出即将开始的时刻，一位演员却拒绝上台，演出眼看就要因此而搁浅了。另一位演员竭力劝他“出山”，但他仍然摇摇头，没有半点商量余地。那位劝他“出山”的演员想把这位赌气者暴露在观众的舞台灯光视线之下，突然把他推上了舞台，以迫使他毫无选择地进入角色。但他并未成功。一场短时间的骚乱使那位不情愿的演员被撇在了一边，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对于部分观众来说，这场争执中的一些东西是显而易见的。

必须指出，这场演出本身就是围绕这一事件的即兴表演。它意味着在表演的一般范围之内，演员是自由的，他们可以罢演，可以对他们所向往的角色进行再创造，可以邀请观众代表上台，可以自行设计服装，可以在观众面前变换服装。正因如此，他们也能把对那位不合作的演员加入他们的愿望加以戏剧化——他们的确做得很有气派。那位演员在那场有争议的场景开始之前就离开了舞台。他在排练期间还是费了心思，虽然他不愿参加。尽管他自认为有办法，但在此后若干星期内这一事件成了他的麻烦。他不得不解决自己和其他作家、演员态度上的冲突。一方面，他体验到了火气。这股气使他不能直面冷漠无情的现实，使他备受自惭形秽的折磨，使他受到冷酷现实的禁锢，或者就像用专业愿望进行干涉一样，对事件本身带有感情色彩。当然，这怒气与这些并不相关。事实十分简单，他不会像他的同事们，对即将开演的节目抱有相同的政治观点。他发现那种表现战争的方式来试图掩盖丑恶，给他造成了极大的不安。每当他出现在舞台上，站在他

^① 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1918— ），南非黑人运动领袖，长期遭南非白人政权的监禁，1990年3月获释，1994年4月当选为南非总统，1999年卸任。



的位置上，面对观众，他就想到自己应对人性正在消失的现状负责。

现在让我们来揭开秘密，把这一事件变得更具体些。这一情景发生在1958年伦敦的皇家剧院，一个星期天的夜晚，那儿正在排练。这是杰出的剧院董事长乔治·德凡的一项革新。他富有创造性地培养了那时激进的英国戏剧，造就了新涌现的像约翰·奥斯本、N·F·辛普森、爱德华·邦德、阿诺德·威斯克、海洛德·品特、约翰·阿顿等人物^①，他甚至要求保守的英国人的鉴赏力要以塞缪尔·贝克特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剧作中的思想奇才为榜样。在这种特殊的场合下，整个夜晚的演出都是一种活生生的戏剧形式。主要剧目是《几个男人死于霍拉营》，其中的演员不全是专业的。实际上，他们多数是剧本的合作者和表演者。政治记忆力强的人也许还能回忆起“茅茅解放运动”^②期间，发生在肯尼亚霍拉营中的事。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只要把肯尼亚人赶到这个特殊的营房内加以分化瓦解，消除黑人的内在实力，这样就可以粉碎“茅茅运动”。噢，问题就这么给解决了。霍拉营就是这样一个营房。这一事件导致了11个被拘留者的死亡，他们都是被营房长官和流浪者殴打致死的。例行公事的调查开始了，这就是真正的报告。它为剧本提供了主要内容，演出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现在我们只需要来认识一下那个不愿意演出的演员，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猜到的话——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我回忆起这真实的场景，如同演员习惯于想到场内熄灯的紧张时刻，刹那间，台词不仅被忘得精光，而且还搞不清何时在剧中出现。我分配到的角色是一个营房卫兵，也是个刽子手。我们佩着警棍，在叙述者朗读一个卫兵的证词时，我们的任务是遵照白人营房长官的命令，慢慢地举起棍子，

^① 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1929—），英国剧作家和电影发行人，剧作《愤怒的回顾》（1956）为英国戏剧开辟了一个新的运动；N. F. 辛普森（N. F. Simpson，1919—），英国戏剧家，代表作《摆去不摆来》（1959）；海洛德·品特（Harold Pinter，1930—），英国剧作家，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富有挑战性的剧作家之一；爱德华·邦德、阿诺德·威斯克以及约翰·阿顿均为英国现代剧作家。

^② “茅茅解放运动”（Mau—Mau Liberration Struggle），20世纪50年代肯尼亚吉库尤人发动的民族解放斗争运动，主张以暴力推翻英国人在肯尼亚的殖民统治，遭镇压后仍坚持斗争，终于在1963年赢得了独立。





机械地把它搁在囚犯们的脖子和肩膀上。这是超越现实的镜头，即使在排练中就可以看出，剧中最后一部分将产生超现实主义的戏剧性场面。诵经室内的叙述者们各就各位，毫无生气，故作姿态地朗读，以铁的事实表现出受折磨者和被害者的思想状态。一小队全副武装的白人军官出现了，其中一人从狱卒那儿抓过棍子，示范怎样打人才会不留痕迹。然而，在押犯心中只有一种武器——非暴力。他们已作出决定进行罢工，如果得不到更好的住宿条件，他们就拒绝工作。因此，他们蹲在地上不动弹，把手缚在膝后以示沉默的抗议。命令一发出，里面一圈黑人土兵进了戏，把手臂往囚犯们的胳膊窝处穿过，像抬起僵硬的蟾蜍尸体似的，把他们分开。

受害者面无表情，他们决定不进行抵抗。于是，毒打开始了，棍子一齐飞舞，此起彼落，打在身体的各个部位。白人土兵的脸上显出带有职业性的满足。他们无精打采地做着手势，意思是要对付另一批人，或者变本加厉地殴打那些刚才未注意到的人。用形象的话来说，这是个流动的接近于芭蕾舞的场面。

与此相反，早期的官方意见证明囚犯们是怎样被误认为死亡的。这个意见证明他们已经垮了，证明他们是死于喝了有毒的饮水。正因为这样，我们把这一点也搬上了舞台。囚犯们蜂拥到了运水车旁，由于干渴，他们大声喘着气。头几个喝了生水后就开始满地打滚，卫兵冲过去阻止后面人再喝。可是不，他们已被干渴折磨得疯了，他们挣扎着冲出重围，贪饮着同样的水。于是，逐渐传来了呻吟声，然后身体扭曲直至死亡。这就是营房长官的意志。

这个主题很简单，其形式也是久经考验的，两者皆忠实于某一规定。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多数作家。为何演出遇到了现实的非难？为何虚构变得过分？剧目上演后会发生什么事？我刚才描绘过的具体戏剧原则有一个显著特征：它不断产生一种强烈气氛，是我已证实了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历史决定现在”。在这种情况下，那种永恒的感觉还可起到驱邪的作用——解脱或催眠。在演出时我们得忍受思想上的一切不幸。同时，在大多数观众看来，每个为自由而献身的战士，是枪上的缺口，是朋友的不幸，是



动物一类或是最好的哑巴工具的死亡，而不是一个爱国者的牺牲。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样的努力能够引起变化。一种提示付诸行动后，能激起意气风发者头脑里的激情，从而导致开始变化的举动。正因为这样，下议院内部提出了许多不愉快的问题。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为那些牺牲者担当起了正义的事业。一些议员甚至亲自到肯尼亚调查以获得揭露官方谎言的细节情况。一种不安的感觉使我的创作意志一蹶不振，也超越了观众。最后，连我自己也到遭受破坏的人性的情感中寻找原因，以不同形式的反应引起的争议为依据，这样，演员对演出便产生了一种不光彩的感觉。正如麻疯病人残废的手臂碰到另一条完好的手臂时产生的那样可怜的感伤。我认为，神秘而又坚决地拒绝演出就是这个原因。它使我提出的要求受到阻碍，它使人觉得这样做还不够，进而嘲笑我的同事。这就像物质的整体——其中的那个场景仅仅是一小部分，它在跟我们说：好好保持你的自尊自爱。

当然，我把这件事仅仅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深层的、内在的创造性思维过程，说明一种使作家在两方面面临危险的过程：要么停滞不前，要么放弃写作，选择更直接的方法与不可接受的现实抗争。霍拉营提供了一种简便的方法以达到我们所指的现实世界。这种现实与我们是截然相反的，它构成了我们时代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事实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个非洲黑人今天会站在这儿。就在今年，贵国激进的首相帕尔梅^①遇刺身亡，就像当年的赛姆拉·麦克尔^②一样，在种族至上主义的卫道士的地盘上遭到毁灭——这一理论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的痛苦。不管奥洛夫·帕尔梅之死的真相如何，他的一生是无可非议的。面对人类泛滥的种族压迫，奥洛夫·帕尔梅做的和说的都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不”字。也许，受到他冒犯的人天真地以为，一个人的死会阻止他的信仰的发展；也许，他们认为暴行能够阻止这些人对种族主义的“背叛”。恐怖主义的流行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足够的



1986年获奖作家

沃尔·索因卡

① 奥洛夫·帕尔梅 (Olof Palme, 1927—1986)，瑞典左翼政治家、社会民主党主席、首相，1986年2月23日在斯德哥尔摩遭人暗杀。

② 赛姆拉·麦克尔 (Samora Machel)，南非黑人领袖，后被暗杀。



推断理由，白人种族主义者将为此而失去道德的平衡。赛姆拉·麦克尔曾经领导他的人民起来反对南非的种族统治，他的力量神秘莫测。是的，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南非国民大会的胜利是符合整个非洲的共同愿望的。然而，敌人穿过边境暗害了麦克尔，他的死当然使敌人兴高采烈，感到这是他们对付黑人的成功战果。

也许这些会被人以为是奇谈怪论吧？让我把话题再回到霍拉营来。关在里面的黑人被当做是马、羊、驴等动物，任意遭到鞭打。事后这些人又解释说，黑人是偶然遭打而死亡的。即使霍拉营事件已经过去了30年，也只有凭着独创性的想像能力才会懂得，一位美国反抗种族主义的战士是如何被那些种族主义者运用电子武器杀死的。因为他拒绝承认一个白人至高无上的世界，实际上自从霍拉营事件之后，黑人一直在为这条道路而进行奋斗，当他们在沙佩维尔^①遭到开枪扫射之时，就意味着这条道路将是难以置信的艰难漫长。自从1930年以来的漫长岁月，这是南非黑人首次组织的反抗行动，他们决心恢复到当年祖鲁人^②的领袖丁戈纳的时代，祖鲁人曾经击败过白人，这象征着黑人公开反抗的开端。这场斗争也激起了卡特莱特·弗拉茨数千名黑人的强烈响应，德班市^③警察当局袭击了这些手无寸铁的抗议者，数十人遭枪杀，数百人受伤。当局为了报复，还焚烧村庄，驱散周围居住的黑人，关押了其中的一部分。1919年，也曾爆发过南非黑人反对当局颁布的《出生证法》的抗议行动，当时的警察仅仅是用马队驱散抗议者而已。与此相比，1930年的镇压措施就大大地升级了，警察包围了抗议者，用鞭子抽打或追逐他们，使那些失散的躲在街头拐角或贫民窟里的人都成了无辜的牺牲者。每一次种族主义的恐怖行动之后，总是伴随着当局对真相的大量篡改和歪曲，镇压手段的逐步升级意味着白人统治者人性的不断沦丧。当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对存在的潜在反对势力的害怕心理，也不得不承认在镇压这些无辜的受害者的同时

① 沙佩维尔 (Sharpeville) 是南非黑人聚居的一个城镇，1960年泛非大会在那里发起非暴力运动，要求废除《通行证法》，遭白人当局镇压，死伤数百人。

② 祖鲁人是南非纳塔尔省的一个部落，南部班图人的一支。

③ 南非纳塔尔省的港口城市。





促进了矛盾尖锐化的程度。来自霍拉营的各种各样证据就是白人统治者这方面罪行的强有力证明，不论是明显的事实还是隐蔽的内幕，都无不证明了发生在那里的不断升级的大屠杀。这就是事实：这些白人统治者在那些无辜牺牲者面前，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人性。这也使得那些牺牲者同样明显地无法体验到作为一个人的应有的尊严。也许他们都被当做了牲口，或者是有毒的生物，而无疑不再被看做是人类的成员了。我不打算在这里声讨殖民主义的霸权罪行，他们的政策有一个明确的方式来表示，那就是一支吹着军号携带着马克沁机枪的军队。他们十分清楚，这种帝国式的绝对统治权力已经显得支离破碎，许多世纪以来所积累起来的人类文明已经遭到了摧残。他们的“文明使命”成了帝国极权的点缀，就像糕饼的一层表皮那样。然而这是真实的，原因在于这些人只懂得权力和服从（像那个来自欧洲白人大陆的艾希曼^①之类），他们——不论是政客、技术专家还是地方长官，在头脑里不存在真实的概念，除非是例外的个别现象，他们并没有这样的认识：“黑人也是人”。确切地说，自上一世纪末至今，在普通的南非白人中间，倒真有过反常的情况出现。下述这个例子便是在那个国家中具有激进思想的人士畅怀所言：

我所想到的以下这个事实，并不是在我最后一年学校生活中才产生的：这些黑人，这些被剥夺了选举权的群众，总在想方设法地关心着我所信奉的社会主义；我想，或许他们在这些日子似乎即将来临的伟大社会革命中要起到什么作用。命中要注定继承这个新世界的“劳动阶级”，自然是以他们的事业来组成自己的联合组织，这些木工、泥工、电车工人和矿工们并对劳动党投了赞成票。我没有想过与本地青年一起讨论政治，也没有想过邀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做客，甚至进一步请他们参加卡那封足球俱乐部。非洲人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过的简直不是人的日子，部分景况就像狗、像树木、像那相距更远的母牛。我对非洲人没



1986年获奖作家

沃尔·索因卡

^① 艾希曼 (Adolf Eichmann, 1906—1962)，德国战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纳粹灭绝犹太人的罪行，后被以色列特工机关捕获并处以绞刑。



有特殊感情，既不感兴趣，也谈不上爱或恨，他们怎么也没有进入我的社会生活圈子。而今，我全盘接受了这个时代的传统观点。是的，我完全相信这位南非政权的叛逆者、科学家埃迪·鲁的自我剖析，并认为这正是今天多数南非白人所认识到的真话。“没有特殊感情，既不感兴趣，也谈不上爱或恨”那正是全盘接受“传统观点”的结果。这段话赢得了那些有理而没有种族歧视倾向的人的心，假如您也同意的话——说这段话的时间是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也就是诺贝尔奖创立的年代。但是，历史无论多么清白，一旦将它暴露于空气之中——不管是新鲜的还是受污染的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现在是1986年，毕竟距离南非黑人公开反抗丧失人性的《通行证法》已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

如同数百甚至数千的本国同胞一样，埃迪·鲁的思想很快便有了迅速的进展。在反种族主义斗争的事业中，他所属的种族也出现了本族的烈士名单——人们至今仍痛楚地记得，露丝·福斯特是被种族主义分子的一枚信件炸弹爆炸身亡的。此外还有——安德烈·布林克、艾布拉姆·费希尔、海伦·萨斯曼——布雷登·布雷登巴赫磨难的伤疤仍在他们的心灵中打下了烙印。知识分子、作家、科学家、国家机关公务员、政治家——他们都讲到这一点：社会的现实决不可能是有涵养地端坐在显微镜下所能观察到的，也不可能成为书本、拳击场或舞台上的美学变化。黑人们被理所当然地关进明确的环境里：在这种场合，“我”不需要称呼“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抱定自己的宗旨。正相反，这种称呼不仅是针对那些身陷死亡营里的人们，还针对那些处于良心边缘的人。尤其是那些厚颜无耻之徒，企图制造神秘的道德主张以为他们无比空虚的政治活动作辩护：“就我个人认识而言，我觉得国际制裁于道义并不相容。”而对于另外一类领袖人物，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因为他反对东欧国家的经济制裁，所以不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地工作；还有那个装模作样地沉湎于歌颂世界的无线电波的大师大叫“不准插手波兰！”不过当全世界高呼“不准插手尼加拉瓜！”时，便摘下了自己的助听器。这些世界领袖人物不知所云的话以及显示的道德规范，也真够你受的了。